

# 农民收入问题： 基于结构和制度层面的探析

黄祖辉 王 敏

**【提要】** 本文将农民收入问题置于经济结构和制度分析的框架中,通过运用国内外相关统计数据,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揭示了农业劳动力对 GDP 的相对贡献;农业与非农劳动力的效率差异。依据这些指标,同时结合城乡居民收入差和转移性收入以及基尼系数等指标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劳动力要素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配置的不合理是中国农民收入问题难解的基本原因,而导致这一不合理结构的重要根源是制度性障碍。不清晰的土地产权制度;偏向城市居民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城市对农民有形与无形的壁垒等等,是这种制度性障碍的主要表现。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视多种要素对农民收入的贡献;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结构;消除城乡壁垒;纠正城市化战略思路;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优化全社会劳动力要素配置,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根本途径。

**【作者】** 黄祖辉 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 敏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

近年来,农民收入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民收入问题的基本症状可以概括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缓慢,相当部分农民收入水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相对收入水平下降;不同地区之间,甚至于同一地区之间的农民收入差异趋于悬殊。中国农民收入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对农民收入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都予以了高度关注。不少学者从农民收入变动、收入结构、农民负担以及产权角度等出发,对农民收入问题和成因作了不少研究,提出了不少对策建议。如张晓山(2000、2001)从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滞留在农业领域,导致农业劳动效率低下,从而使农民收入难以增加的角度,从现行倾向于城市和国有工业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角度,分析了农民收入低迷的原因。郭建军(2001)、盛来运(2001)等也做了类似的工作。周其仁(2001)则从产权的角度对农民收入问题进行解释,分析了导致农民收入增长停滞的农民承包地产权残缺、现有粮食保护政策下政府对农产品流通市场的垄断、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土地产权受到侵害并被廉价征用、农村金融、区域市场的垄断等一系列问题。孙立刚(2001)也从产权的角度做了相关的分析。史清华等(2001)通过对中国东、中、西 3 个地区农民的实地调查,通过翔实的数据对 3 个地区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进行了实证与比较分析。为了对农民收入问题及其解决思路有更为准确的认识与把握,本文从产业结构与制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 一、分析农民收入问题的一个视角:不同部门劳动力对 GDP 的贡献系数

农民收入问题不仅仅是农业和农村本身的问题,它与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与制度安排密切相关。仅从农业或农民收入数据看农民收入问题不足以洞察问题的实质,应把农民收入问题置于经济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去分析、认识与把握。因此,不仅应分析农民的人均收入及其变动数据,而且应将其与其他的关联性指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些关联性的指标或数据至少包括人均 GDP、农业

GDP 的比重、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比重、社会不同部门(农业与非农部门)劳动力对 GDP 的贡献及其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与差异程度(基尼系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关系等等。

在表 1 中,我们分别列举了浙江、湖南、贵州三省和全国在 1984 和 2000 这两个年份的有关指标和分析数据。浙江、湖南、贵州三省分处中国东、中、西部地区,2000 年 GDP 值分别列全国第四位、第十二位、第二十六位,应该说有较强的地区代表性。这里,我们将 A 定义为农业 GDP 占总 GDP 的比重;B 为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A/B 定义为平均每个单位农业劳动力对 GDP 的贡献系数(或单位农业劳动产出的相对效率); $(1-A)/(1-B)$ 则定义为平均每个单位非农部门劳动力对 GDP 的贡献系数(或单位非农部门劳动产出的相对效率); $[(1-A)/(1-B)]/(A/B)$ 为非农部门劳动力与农业部门劳动力对 GDP 的贡献系数之比。从表 1 的有关分析数据中,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判断与结论。

从农村劳动力贡献系数的含义来看,如果 A/B 值等于 1,那么,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单位劳动力对 GDP 的贡献系数(或相对劳动产出效率)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单位农业劳动力与单位非农部门劳动力所创造的 GDP(或者说两大部门劳动要素的边际贡献率)是均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说不会存在所谓的农民收入问题。但在表 1 中,无论从 3 个省的数据,还是从全国的平均水平看,A/B 值都大大小于 1,而且 2000 年的 A/B 值明显小于 1984 年。浙江、湖南、贵州省和全国的农村劳动力贡献系数从 1984 年到 2000 年分别下降了 50%、43%、21%、36%。这表明,相对于非农部门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进步,农业劳动的相对效率是在降低,而不是提高。农业劳动的产出效率远低于非农部门劳动的产出效率,农民从事农业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份额要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因此,尽管农业的 GDP 在不断增大,但由于农业 GDP 占整个 GDP 的份额在不断下降,同时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速度慢于农业 GDP 份额的下降速度,农业劳动力对 GDP 的贡献系数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

鉴于非农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有明显的提高,2000 年非农部门劳动力对 GDP 的贡献系数与 1984 年相比,也有一定的下降,但降幅不是很大。表 1 中浙江、湖南、贵州省和全国的 $(1-A)/(1-B)$ 值从 1984~2000 年期间分别下降了 6.5%、4.7%、25.7%和 11%。但是,除了贵州省以外,由于农业劳动力对 GDP 的贡献系数的下降幅度大,非农部门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对 GDP 的贡献系数之比仍呈扩大趋势。浙江、湖南和全国分别扩大了 87.45%、65.89%和 39.15%,仅贵州省降低了 5.9%。

表 1 全国和若干省份的相关数据

	全 国		浙 江 省		湖 南 省		贵 州 省	
	1984	2000	1984	2000	1984	2000	1984	2000
GDP(亿元)	7 171	89 403	322.07	6 036	287.29	3 692	108.27	993.5
人均 GDP(元)	695	7 078	807	13 461	519	5 639	371	2 662
农业 GDP(亿元)	2 295	14 212	104.40	664	128.28	785	45.73	271
农业 GDP 比重(%)A	32.0	15.9	32.4	11.0	44.7	21.3	42.2	27.3
农业劳动力比重(%)B	64	50	55.7	37.8	73.8	60.8	80.7	67.3
农业劳动力贡献系数 A/B	0.5	0.32	0.58	0.29	0.61	0.35	0.52	0.41
非农部门劳动力贡献系数 $(1-A)/(1-B)$	1.89	1.68	1.53	1.43	2.11	2.01	2.99	2.22
非农与农业劳动力贡献系数之比 $[(1-A)/(1-B)]/(A/B)$	3.78	5.26	2.63	4.93	3.46	5.74	5.76	5.42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元)C	651.2	6 283	669	9 279.2	645	6 218.73	558	5 122.2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D	355.3	2 253	446	4 253.7	348.2	2 197.16	262.81	1 374.2
城乡居民收入比 C/D	1.8	2.8	1.5	2.2	1.9	2.8	2.1	3.7

注:表中有关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在其基础上的整理。

改革以来中国农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根据表1的数据计算,2000年浙江、湖南、贵州三省及全国的农民收入分别比1984年增长了8.54倍、5.31倍、4.23倍和5.34倍。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因此缩小,反而扩大了。从表1可见,无论是农民收入连续16年处于全国第一的浙江省,还是湖南和贵州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从1984年到2000年分别扩大了47%、47%、76%,全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由1.8:1扩大到2.8:1,扩大了56%。我们认为,改革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既与不同部门劳动力对GDP的贡献系数差异有关,又与国民收入(GDP)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相关。

中国农业劳动力与非农部门劳动力对GDP贡献系数的悬殊差异,与其说是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生产效率差异所致,毋宁说是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配置的制度障碍所致。城乡之间有形或无形的隔离,广大农民不能获得应有的国民待遇,是这种制度障碍的集中体现。在这种制度约束下,一种扭曲的均衡得以形成,即全国50%的农业劳动力与15.9%的GDP相对应,50%的非农部门劳动力与84.1%的GDP相对应。很显然,在这样的格局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再分配手段,不仅农民的收入水平很难提高,而且广大农民在收入分配中也不会成为强势群体。

从上述分析与判断中可以引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改革以来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这一期间农业劳动力对GDP的贡献系数却不断降低,较多农业劳动力提供较少GDP和较少非农劳动力提供较多GDP的格局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因农民收入的提高而缩小,反而是扩大了,表明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在下降。再联系到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相当部分农民收入下降的状况,可以认为,与80年代相比,中国目前的农民收入问题不是在趋于缓和,而是更严峻了。

## 二、农民收入问题的动态考察:结构变动、贡献系数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表2给出的是1978~2000年中国相关指标的动态变化。从总体看,呈现如下特征。(1) GDP和人均GDP逐年上升,年均分别增长15.68%和14.23%。在这期间,农业GDP年均增长12.73%,但1996年以来增幅趋缓,年均仅为0.66%,2000年还略低于1998年的水平。(2) 农业GDP的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年平均下降速度为2.55%,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但年平均下降速度为1.55%,要慢于农业GDP比重的下降速度,尤其是1996年以来,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几乎没有减少。(3) 农业劳动力对GDP的贡献系数也呈下降的态势。(4)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年均分别增长14.12%和13.7%(1996年以来增幅明显下降,年均分别增长6.74%和3.99%),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却由改革初期的逐步缩小(1978~1984年),转而逐步扩大。不仅如此,2000年和2001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甚至比1978年时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还要大。

表2中的有关数据变化情况表明,非农与农业劳动力贡献系数比和城乡居民收入比走势基本上相同,即在1984~1992年和1996~2000年的区间内上升;在1978~1984年和1992~1996年的区间内下降。而农业劳动力贡献系数的走势则刚好与此相反。表明这种波动正好与中国1978年以来的农业波动周期的经验事实相吻合,即在1978~1984年间,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化肥投入的增加、农产品提价等因素的同时作用,迎来了农业的高速增长,而此时城市改革还未开始,因此,农业劳动力贡献系数上升,非农与农业劳动力贡献系数比和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而在1984~1992年则由于制度贡献的释放、农业劳动力外流、收购政策的变动等因素导致农业的增长速度放慢,此时,城市改革启动,非农产业迅速发展,因此,农业劳动力贡献系数下降,非农与农业劳动力贡献系数比和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1992~1996年区间的情况有点复杂,其中1992~1994年间的非农产业,先是1989~1990年的增速变缓,但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又转而快速增长;1995~1996年间农业丰收,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因此,走势显示出略微的不一致。而1996~2000年间由于农

表 2 1978~2000 年中国相关数据的动态变化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GDP (亿元)	3 624.1	4 517.8	5 394.7	7 171	10 202	14 928	18 548	26 638	46 759	67 885	78 345	89 403
人均 GDP (元)	379	460	526	695	956	1 355	1 634	2 287	3 923	5 576	6 307	7 078
农业 GDP (亿元)	1 018.4	1 359.4	1 761.6	2 295.5	2 763.9	3 831	5 017	5 800	9 457.2	13 844	14 522	14 212
农业 GDP 比重(%)A	28.10	30.09	32.65	32.01	27.09	25.66	27.05	21.77	20.23	20.39	18.54	15.90
农业劳动力比重(%)B	70.50	68.70	68.10	64	60.90	59.30	60.10	58.50	54.30	50.50	49.80	50
农业劳动力贡献系数 A/B	0.40	0.44	0.48	0.50	0.44	0.43	0.45	0.37	0.37	0.40	0.37	0.32
非农部门劳动力相对系数 (1-A)/(1-B)	2.44	2.23	2.11	1.89	1.86	1.83	1.83	1.88	1.75	1.61	1.62	1.68
非农与农业劳动力贡献系数比 [(1-A)/(1-B)]/(A/B)	6.11	5.10	4.40	3.78	4.19	4.22	4.06	5.06	4.69	3.98	4.36	5.29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元) C	343.4	477.6	500	651.2	899.6	1 181.4	1 510.2	2 026.6	3 496.2	4 838.9	5 425.1	6 283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D	133.6	191.3	270	355.3	423.8	544.9	686.3	784	1 221	1 926.1	2 162	2 253
城乡居民收入比 C/D	2.57	2.50	1.85	1.83	2.12	2.17	2.20	2.58	2.86	2.51	2.51	2.79

注：表内有关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其基础上的整理。

业的连续丰收,出现了农产品供大于求,农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的局面,这导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持续下降,农业劳动力贡献系数下降,非农与农业劳动力贡献系数比和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农民收入问题进一步突显。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如果不实行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不改变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配置结构,中国的农民收入问题将难以解决。也就是说,在产业结构不断演进和农产品过剩的情况下,如果过多的社会劳动力配置于农业部门,则不仅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的低效率利用,而且会导致这部分社会劳动力的收入问题,即农民的收入问题。

### 三、农民收入问题的进一步分析:中国与若干国家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的农民收入问题,我们选择若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统计数据作一比较分析(见表 3)。

首先,农业 GDP 比重以及农业劳动力比重与人均 GDP 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见图 1、图 2)。从表 3 可见,那些人均 GDP 很高的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和韩国,农业 GDP 的比重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都很低,而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些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较低,但农业 GDP 的比重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却很高。由于人均 GDP 与居民收入存在正的相关性,所以,要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减少农民进而降低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是一条重要途径。

其次,从表 3 还可以发现,尽管发达国家的农业 GDP 比重很低,都在 10%以下,但由于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也不高,因而农业劳动力对 GDP 的贡献系数也不低,基本上都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相反,发达国家非农部门劳动力对 GDP 的贡献系数却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的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要低于发展中国家,只能说明发达国家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力的比较效率差异要比发展中国家小,这恰恰是发达国家劳动力要素在部门间优化配置的表现。这一点可以从非农部门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对 GDP 贡献系数的比例关系得到印证。从表 3 可见,发达国家的非农与农业劳动力贡献系数比值要明显小于发展中国家,这既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要优于发展中国家,又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实质,即较高份额的社会劳动力从事份额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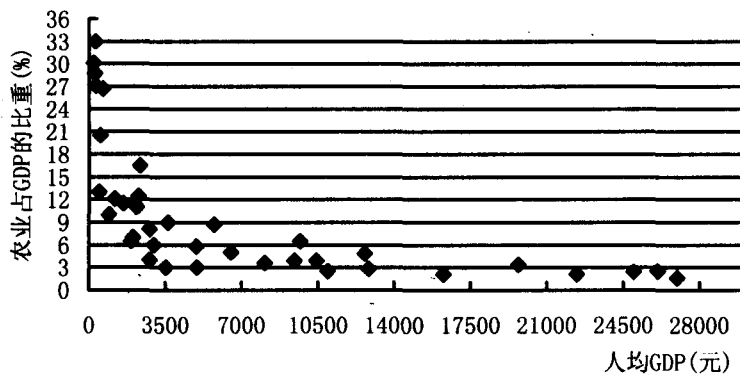


图1 人均GDP与农业占GDP比重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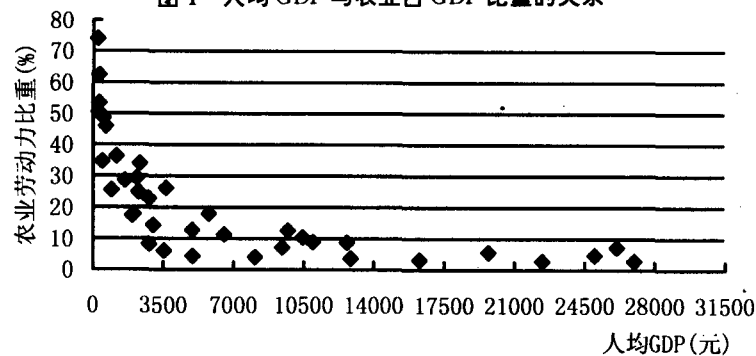


图2 农业劳动力比重与人均GDP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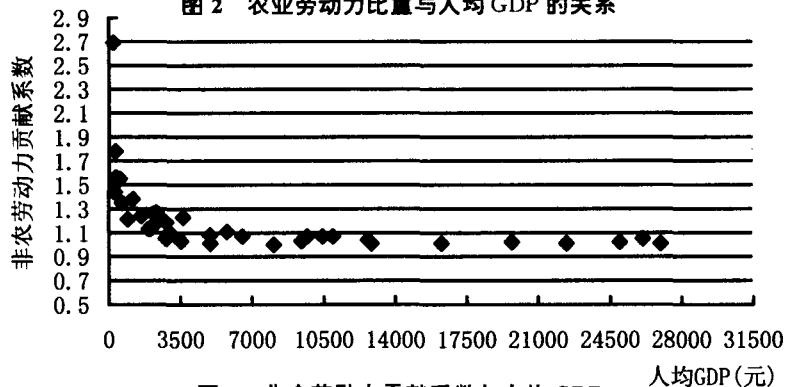


图3 非农劳动力贡献系数与人均GDP

的农业GDP生产,导致了相对低的贡献系数(或产出效率)和相对低的收入水平。

再次,从图3的各国人均GDP和非农劳动力贡献系数的关系图来看,非农劳动力贡献系数随着人均GNP的增长而下降,而且最终停留在1附近。这正好表明,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非农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单位劳动产出的差距不大,劳动力要素配置和经济结构更为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表3中反映居民收入差异性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不低,1998年达到了0.403,与1997年美国的0.408不相上下,大大高于日本、韩国、法国和德国。按照一般判别标准,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明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合理,处于0.4~0.5之间则表明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超过0.5被认为是社会贫富差距悬殊。0.4以上的基尼系数意味着中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

表3 人均GDP、农业劳动力贡献系数和基尼系数的国际比较

	中国	日本	韩国	美国	法国	德国	印度	巴西
人均GDP(美元)	782	34 459	8 682	33 846	26 050	25 508	446	3 697
农业占GDP比重(%)A	18	2	6	2	2	2	25	8
农业劳动力比重(%)B	49.8	5.2	11.7	2.7	4.2	2.9	60.1	26.4
农业劳动力贡献系数 A/B	0.36	0.38	0.51	0.74	0.48	0.69	0.41	0.30
非农部门劳动力贡献系数 (1-A)/(1-B)	1.63	1.03	1.06	1.01	1.02	1.01	1.88	1.25
非农与农业劳动力贡献系数比 [(1-A)/(1-B)]/(A/B)	4.53	2.71	2.08	1.36	2.12	1.46	4.58	4.17
基尼系数	0.403 (1998)	0.249 (1993)	0.316 (1993)	0.408 (1997)	0.327 (1995)	0.30 (1994)	0.378 (1997)	0.60 (1996)

注:数据分别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D)的《2000世界竞争力年鉴》和世界银行的《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表中人均GDP为1999年数据,按现行价格、汇率计算。农业占GDP比重为1998年数据。农业劳动力比重为1999年数据。

距较大,已超过了基尼系数为 0.4 的国际警戒线,而农民收入偏低则是原因之一。

#### 四、从国民收入再分配看农民收入问题:关于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的例证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范畴,是一种制度性的收入,而不是要素本身的收入。在中国,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主要包括在外人口寄回或带回的收入、救济款、救灾款、退休金、抚恤金、社保金、土地征用补偿金等。因此,撇开在外人口寄回或带回的转移性收入,其余转移性收入的多少和对象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偏好和社会再分配的制度有关。

表4给出的是1993~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年转移性收入和该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的比重。很显然,无论是绝对额还是相对额,城镇居民所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和相对份额,都要大大高于农村居民。不仅如此,两者的差距还呈现进一步的扩大,这可以从表4的相关数据和图4的两条曲线走势得到证实。城镇居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大大高于农村居民,并且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表明农民在社会基本保障等方面,还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国民待遇;表明现行社会再分配制度仍然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这种转移支付制度不利于广大农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农民的利益保障和收入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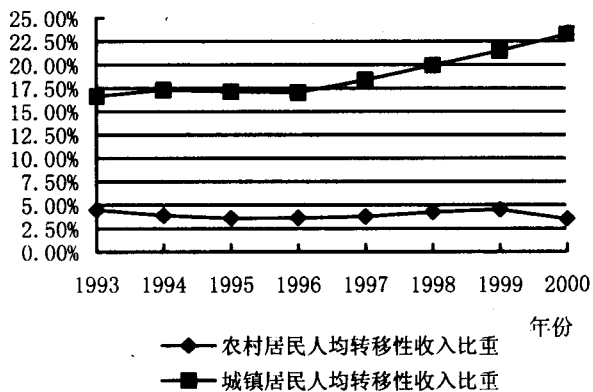


图4 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异

#### 五、结构变革与制度创新: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基本思路与途径

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要从多方入手,其中,加快结构变革和制度创新是根本途径。

首先,要把农民真正视同社会劳动者,而不仅仅是农业劳动者,这样,农民增收的途径就会宽广得多。中国是人多地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家,这一国情不仅历史上存在,现在存在,而且将来很长一段时间还将存在。这就决定了以土地粗放型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中国不具有现实可行性。而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又往往形不成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难以给单位劳动力带来较高的收入。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要跳出农业找出路。在浙江、湖南、贵州三省中,浙江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耕地是最低的,只有0.92亩/人,(湖南省为1.14亩/人,贵州省为1.08亩/人),浙江省GDP中农业的比重在1984~2000年间也下降很快。但是,浙江省农民收入却连续16年保持全国第一,其原因之一是浙江省农民的收入主要不是来自农业,而是来自非农产业,近两年非农产业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已达到80%左右。这表明,要提高农民收入,

表4 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b>农村居民</b>								
人均转移性纯收入(元)a	41.61	47.59	57.27	70.19	79.25	92.03	100.17	78.81
人均纯收入(元)b	921.62	1 221	1 577.7	1 926.1	2 090.1	2 162	2 210.3	2 253
人均转移性收入比重(%)a/b	4.51	3.90	3.63	3.64	3.79	4.26	4.53	3.50
<b>城镇居民</b>								
人均转移性收入(元)c	428.66	606.11	734.83	825.87	947.78	1 083	1 257.17	1 461.8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d	2 577.4	3 496.2	4 283	4 838.9	5 160.3	5 425.1	5 854	6 283
人均转移性收入比重(%)c/d	16.63	17.34	17.16	17.07	18.37	19.96	21.48	23.2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应各年。

就要让农民走出传统农业生产的圈子,将剩余农业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流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使社会不同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或者对GDP的贡献趋于均等。这些部门既包括与农业不相关的二三产业,又包括与农业密切相关的二三产业,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为农民就业和增收领域的拓展提供了现实途径。事实上,不少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尽管很低,但在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农业产后加工、储运、保险与服务领域却容纳了相当多的就业岗位,两者加起来的劳动力通常要占社会总劳动力的20%~25%。

其次,农民增收不能仅局限于劳动要素本身的收入,而应将其他要素的收入也纳入农民增收的视野。农民的货币资本、土地(承包权与使用权)权益、技术以及投资的不动产等,都应该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源泉。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农民的收入之所以比较高,原因不仅在于来自非农产业的劳动收入比重高,而且还在于相当多的浙江省农民是个体私营业主,他们收入中的很大部分是来自于投资性收益,而这种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要比劳动收入高得多。

再次,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关键还在于深化改革和创新制度,彻底消除农民增收的制度性障碍。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培育农村要素市场。要在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在法律上赋予农民永久性的土地承包权,并使这一权力物权化。与此同时,要培育和发展农村的要素市场,包括建立农村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的转让市场;调整国家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机制和利益分配关系;发展农民房产和其他资产的租赁、转让、拍卖等交易市场。

第二,彻底消除城乡壁垒。不仅要消除城乡户籍身份制度的差异,而且要消除城市在就业、教育、居住、医疗等方面对农民的差别政策和“技术”壁垒,以增强城市对农民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在城市化进程中,要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防止新的城市偏向。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标志不是城市的扩张,而是农民的减少,因此,有必要把中小城市的发展放在优先地位,并且同步考虑农民问题,特别是失地农民的利益补偿、迁移进城与再就业等问题。

第三,继续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要在取消各种不合理的农民负担的同时,推进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尤其应加快乡镇机构的改革、人员的精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村级民主制度的建设。同时,要积极支持和发展农民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行业协会,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的自我保护意识。

第四,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要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结构,加大政府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使农民在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能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国民待遇。与此同时,要完善税收体系和征管制度,重点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力度,防止社会不同阶层,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 参考文献:

1. 张晓山:《农民收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农业经济问题》,2000年第6期。
2. 张晓山等:《关键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农民增收问题之我见》,《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6期。
3. 郭建军:《现阶段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特征、面临的矛盾和对策》,《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6期。
4. 盛来运:《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思考》,《统计研究》,2001年第1期。
5. 周其仁:《关于三农问题的参考》,“中国制度经济学理论研讨会”论文(未刊稿),2001年9月。
6. 孙立刚:《资源、产权与农民收入问题》,《农业经济问题》,2001年第12期。
7. 史清华等:《中国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结构变化及根源》,《河北学刊》,2001年第5期。

(责任编辑: 朱 犁)